

心阅古城



● 东昌望族之傅家

傅氏两望族

清孝是家风



▲ 位于古城楼东大街东侧东关街的傅斯年陈列馆。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


傅斯年塑像。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
故事聊城

本报记者 杨淑君

“任、邓、朱、傅、耿”东昌五大望族，其中，“朱”家有两家，本专栏已撰文介绍(见7月15日刊登《东昌五望族，朱家是哪家?》)；其实，“傅”家也有两家，分别是傅光宅家族和傅以渐家族，即“御史傅”和“阁老傅”。

“阁老傅”后人、69岁的傅尚范告诉记者，“阁老傅”、“御史傅”的说法是近年研究者提出来的，过去民间说法是“北门里傅”和“清孝街傅”或者“西门里傅”。古城北门里路东为“阁老傅”傅以渐“相府”故址，而东关清孝街原有“御史傅”傅光宅故居，西门里路南(原聊城市特殊教育中心北到楼西大街)原有傅光宅后人所居的“傅家公馆”。傅尚范查阅两家傅氏族史资料，发现两家族的辉煌有很多共同之处。

为官：勤政显业绩 清廉载史册

“毛驴县官生得怪，骑着毛驴去上班。挣得白银不翼飞，骑着毛驴又回来。”这是明代赞扬陕西米脂知县、聊城“御史傅”先人傅相则的民谣。傅相则在陕西为官期间，看到那里土地贫瘠，百姓缺少衣食，就让人们学习条编技术，编筐、篾、囤之类，销向外省，使百姓富裕起来。而他自己清廉自守，出行皆骑毛驴，落了个“毛驴县官”的绰号。

《东昌望族》记载，傅相则的孙子傅光宅(1544—1601)，字伯俊，别号金沙居士。明隆庆四年(1570)中举人，万历五年(1577年)成进士，历任灵宝知县、吴县知县、重庆知府、河南道监察御史、南京兵部郎中、工部郎中、按察副使、督学政等职。傅光宅文武全才，政绩颇丰。他在担任吴县知县时，遇到灾年就开仓救荒；平常年月，在青黄不接时节，实行以青苗抵押借贷的办法，使农民度过难关。他倡导村庄里办私塾，鼓励人们学习。他鼓励发展植桑养蚕、种植茶树、果树。经过几年治理，吴县出现了人民安居乐业、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局面。

万历十三年(1585年)，傅光宅奉召进京，当朝上疏六事，皇帝皆采纳。傅光宅奉命按行两关时，结识了镇守蓟门的大帅戚继光。戚继光后来遭到给事中张鼎思暗算，皇上将戚继光改任广东，傅光宅听后，连夜上疏，遭皇上夺俸。数年后才得以复职。傅光宅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去世，时年五十六岁。

傅光宅的儿子傅尔庚、侄子傅尔恒、傅尔谦等人分别担任过地方官，也都清正廉洁。傅尔恒，字纯一，以选贡授太仓州判。太仓州是个海水淹没的浅海滩，海潮常常淹没村庄，稼禾、农舍，百姓生活极度困难。傅尔恒上疏当朝，免征皇粮国税；并从苏州调入大米，以工代赈；开苏州大塘80余里，挡住了海水侵蚀。岳阳春季气候干旱，小麦往往颗粒不收。而在夏季汛期来临，汾河泛滥成灾，农作物减产、绝产，百

姓流离失所。在大灾之年，岳阳知县傅尔恒一方面上疏救济灾民，一方面开仓赈荒。百姓感泣万分，自发凑钱为傅尔恒建生祠，立功德碑，以示纪念。

傅尚范介绍，“阁老傅”的代表人物、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虽然官居相位，也是勤于政事，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。傅以渐多次升迁，历任国史院侍讲，秘书院侍讲学士，国史院学士、秘书院大学士、国史院大学士等职。傅以渐奉诏陈述时务，他上奏安民策，因所奏合国情，顺君意，遂加封太子太保。傅以渐对人才非常重视，任会试主考官期间，日夜不息操劳考务。过度的紧张劳累，使他得了重病。皇帝为之感动，加封其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进阶光禄大夫。顺治十八年(1661年)，上书称病而解任还乡。康熙四年(1665年)，傅以渐病逝，享年五十七岁。

傅以渐玄孙傅绳勋，字接武，号秋屏。自幼刻苦读书，嘉庆十八年(1813)中进士。先后任工部主事、广东琼州知府，广东盐运使、陕西按察使，广东云南布政使、浙江巡抚等。在潮州任职时，城内有洋人，引起百姓闹事。傅绳勋前去处理，恩威兼施，使事件迅速平息。后因积劳成疾，于咸丰元年(1851年)辞官返乡。傅绳勋是道光年间拔贡，长期在安徽一带任职，官至安徽布政使，为官清正廉明，深得当地民众拥戴。辞职回家后与傅绳勋共同致力于地方文化传播。

为人：孝义是家风 德行留美谈

傅光宅在其母去世之时，虽年事已高，告归奔丧仍然星夜奔驰，痛不欲生，以致须发皆白。傅光宅为官期间，对家族子弟不分内外远近，无所不亲，设义学教授他们，量才投资，并朝夕督课。即使外族乡里送子弟来读书，他也一视同仁。并置五百亩肥沃田地，以救济贫穷者。

傅光宅的侄子傅尔恒曾因“清孝”而被当地人广为传诵。傅尔恒退职在家时，和继母一起生活，每日早晚守候在继母身边，竭尽孝道。监察院的御史

中丞为之感动，挥笔为其门额题写了“清孝先生之闾”。从此，他住过的街道被命名为“清孝街”。据记载，傅尔恒任职太仓州判时，曾经拿出自己的常例薪俸二千余两，作为当地百姓发展生产的资金，得到百姓的拥戴。傅光宅的另一位侄子傅尔谦，字恭让，能文能武。清兵进攻江南时，他参与守城，为国捐躯。

傅尚范讲，傅以渐的伯父傅思义继承父业(其父借运河之便从事商业)，商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，生意兴隆。傅思义，字完贞，生而凝重厚道。侄子傅以谦、傅以晋、傅以渐读书进学的一切费用均由伯父傅思义支出。傅以渐说过：“少年读书时，束修衣食俱是伯父完贞公资给，全不知有贫贱之苦，如此者十二年，至伯父卒方止。”

傅正揆，字硕臣，号华瞻，康熙二十一年(1682)进士，授山西大同府山阴知县，他轻徭薄赋，捐出资财以济贫穷，捐俸禄修学校，对为非作歹者严惩不贷。

光绪九年(1883)，傅斯悻担任湖州知府。有乡民闹事，要求缓征赋税。有人提出以武力镇压，傅斯悻反驳道：“那是对付强盗的办法，不能用来对付老百姓。”他孤身一人来到闹事者面前，讲清道理，劝退百姓。然后，奏请上司，免除了赋税。后任杭州知府时，他取消了扰乱市场、危害民生的一些钱票，受到百姓拥护。他病死于任所时，百姓自发哀悼，并组织祭祀活动。

监生傅青籍，字函史，在夜间外出时捡到一布袋银子，重达百余斤，令儿子到大街上寻找失主。其子在通济桥上，见有一个商人正欲投河，拦住一问，商人因为丢了巨资回去无法交代，故而想寻短见。于是，钱归原主，商人千恩万谢。

几百年来，傅氏两族和睦相处，甚至视为一脉。“阁老傅”家族中曾有多位参加科举考试者，在所填履历表中把傅光宅当作族中先人填入，如傅潜把傅光宅写成“六世伯叔”。傅尚范解释：“这是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叫作‘联宗’。也说明‘阁老傅’家族对傅光宅非常尊重和敬仰，证明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亲密关

系。” 为学：考究出名著 博览成奇才

傅光宅颇具才品意气，史书记载他“博闻强志，贯串百家，落笔千言，词采流丽，诗在唐盛盛之间，书模黄豫章，苍郁有致”。傅光宅善写榜书，常为所过祠庙题额；他文采横溢，留下许多文献著作，诗文传世，如《奏疏》、《四书讲义臆说》、《吴门燕市》等流传至今。

傅以渐幼年家境清贫，天资聪颖，勤奋苦学。据记载，他“颖悟强识，三岁能诵书，五岁熟记经史不遗一字，十岁工属文，博极群书。”傅以渐辅佐顺治十八年，又是康熙的启蒙老师。康熙南巡时，路过东昌府，为感恩恩师，御笔题赠对联：“传胪姓名无双士，开代文章第一家”，横批是“圣朝元老”。

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公居相位，食不重味，衣皆再浣，与寒素无异。”他书写奏议，草拟诏书、御制，颇得皇帝赏识。傅以渐曾纂修《明史》、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充任清太祖、太宗《圣训》总裁，奉命与曹本荣合著《周易通注》。他一生著述颇丰，治学严谨。现有《四书易经制义》尚存于世；曾于康熙二年(1663)在家养病期间，主持编纂了《聊城县志》。

清末运河漕运废止，科举制废除，在这一历史变革中，两个傅氏家族的家风依然延续下来，如“阁老傅”家族中的傅斯年、“御史傅”家族中的傅懋勤都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，又能适应时代变迁，成为现代著名学者。

傅尚范说，傅斯年五岁时跟随身名师孙达宸学习，接受传统教育。先后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、北京大学、伦敦大学、柏林大学。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北京大学代理校长，台湾大学校长等职。傅斯年在学术上，注重史料的发现、考订，发表过不少古代史论文，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。

“阁老傅”后人中还出现了傅乐成、傅乐焕、傅乐淑三位历史学家，三人从不同方面对外族



傅光宅画像。

和中外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。傅乐成任职台湾大学，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，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。在1960年出版过《中国通史》。傅乐焕致力于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研究，他在学术上多有建树。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，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。她的著作《中西交通史编年》，在这个领域颇有影响。

“御史傅”后人傅懋绩，古城步云阁街人，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著名学者。1939年，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于文科研究所工作，后任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194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语言学，获博士学位。1950年回国，历任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所长，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。他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著述甚多，并不遗余力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才，促进了民族语言学学科的发展。

傅懋绩之弟傅懋勉，1934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，“七七”事变后，随校到云南昆明，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。毕业后历任保山仰光中学教师、云南大学讲师、副教授，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。发表过颇有学术价值的《白居易的格律诗》、《杜工部的诗法》、《诗律诗》、《对史记中几篇列传商榷》等多篇论文或著作。